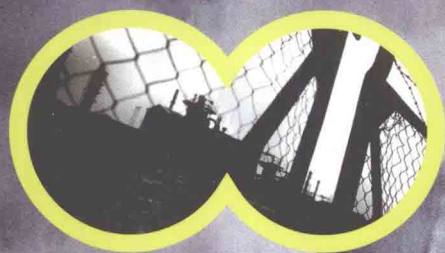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核灾难口述史

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 王甜甜 译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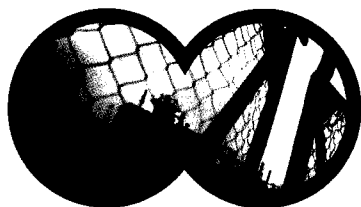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社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核灾难口述史

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 王甜甜 译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凤凰出版社

图字：10-2011-59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白俄）阿列克谢耶维奇著；王甜甜译.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506-0924-2

I. ①切… II. ①阿…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7141号

VOICES FROM CHERNOBYL © 2005 by Svetlana Alexievich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vetlana Alexievich-re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Agent Galina Dursthoff.

- 书 名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 著 者 （白俄）阿列克谢耶维奇
- 译 者 王甜甜
- 责任编辑 王志钧
-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庄村，邮编：065200
-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 印 张 16
- 字 数 235千字
-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924-2
- 定 价 32.80元

历史记录

白俄罗斯境内并没有任何核电站。苏联国土境内仍在运作的核电站中，距离白俄罗斯最近的几座都是由苏联设计的老式石墨减速沸水式核电站。白俄罗斯以北是伊格纳林斯克核电站，以东是斯摩棱斯克核电站，以南则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4月26日，深夜1点23分58秒，一系列的爆炸摧毁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中的反应器。切尔诺贝利事故也最终成为了20世纪破坏力最大的一次技术灾难。

对于面积狭小的白俄罗斯（全国人口总数：1000万）而言，这简直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摧毁了619座白俄罗斯城镇，数以万计的白俄罗斯人惨遭屠杀。几十年后，切尔诺贝利事故使这个国家失去了485座村镇，其中有70座村镇被永远地埋在了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今天，每五名白俄罗斯人当中就有一人仍然生活在受辐射污染的土地上。按照其全国人口数量折算，生活在受污染地区的白俄罗斯人数高达210万，而这其中还有70万是儿童。在所有导致白俄罗斯人口数量下降的诸多因素当中，辐射污染高居榜首。在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最严重的戈梅利和莫吉廖夫地区，当地人口死亡率比新生儿的出生率高出了20个百分点。



5000万居里的放射性核素被释放到了空气之中，其中有70%降落到了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从而导致了白俄罗斯23%的国土面积受到了浓度超过1居里/平方千米的放射性核素铯-137的污染。乌克兰受污染的国土面积达到了4.8%，俄罗斯为0.5%。因为这次事故受到污染且污染浓度超过1居里/平方千米的可耕种土地面积超过了1800万公顷，2400公顷的可耕种土地被永久废弃，再也无法从事任何农业生产。白俄罗斯是森林之国，但是其境内26%的林地和靠近普里皮亚季河、德涅波河以及索日河的很大一部分湿地都被认为已经受到了核辐射的污染。由于长期受到小剂量核辐射的侵害，白俄罗斯人当中罹患癌症、智力迟缓、神经紊乱及基因变异疾病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百科全书》）

1986年4月29日，波兰、德国、奥地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仪器监测到了空气中的辐射浓度异常。4月30日，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发现了高浓度的放射性微粒。5月1日、2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及希腊北部发现辐射。5月3日，以色列、科威特和土耳其检测到辐射异常……在流动的空气的帮助下，放射性物质很快就完成了它们的环球旅行：5月2日，它们抵达日本，5月5日到达印度，5月5日、6日，它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登陆。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切尔诺贝利事故就从一个国家的问题演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

——《切尔诺贝利事故对白俄罗斯的影响》

国际国立生态萨哈罗夫大学，放射生态学

明斯克

在4号反应堆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石棺”——由铅和金属制成的内核中仍然存放着20吨核燃料。谁也不知道石棺内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石棺设计独特，建造精良，来自圣彼得堡的工程师们也许应该为自己的这一杰作感到骄傲。但是，它是在无人操作的条件下建造完成的，人们借助机器人和直升机的帮助，将厚重的钢板拼接在一起，所以迄今为止，钢板衔接处留有不少缝隙。根据某些数据显示，现在，这座石棺上的空塌和裂缝面积已经超过了200平方米，而放射粒子仍然在源源不断地从石棺中泄漏出来……

石棺会坍塌吗？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至今为止，人们仍然无法到达石棺的关键结构及许多连接处，从而无法得知它是否坚固如初。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假如石棺坍塌，其后果一定比1986年的那次事故更加可怕。

——《精神》杂志，1996年4月，第17期

序：一个孤独的声音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M.马马尔达什维利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死亡、爱？或者，这二者之间本无区别？我到底该说哪一个呢？

当时，我们新婚燕尔。即便是去商店，我们也会手牵着手一同前往。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可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有多深。我不知道……我们住在他工作的消防站的宿舍楼里。我们家在二楼。住在同一层楼的还有其他三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消防卡车就停在我们楼下。红色的消防车。他是一名消防员。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一直都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

一天晚上，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下床走到窗边，向外面望去。他看到了我：“关上窗户，回床上去睡觉。反应堆着火了。我很快就回来。”

我并没有看到爆炸，我只看到了火苗。一切都在发光发热，包括天空在内。汹涌的火苗夹带着黑色的浓烟直冲云霄。空气中袭来令人窒息的热



浪，令人感觉很不舒服。他还没有回来。

核电站的屋顶上铺着一层沥青，浓烟就来自于燃烧的沥青。后来，他说走在那上面就像是走在熔化的柏油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扑灭大火。他们用自己的脚去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他们当时并没有穿帆布制服。他们穿着体恤和衬衣冲进了火场。没有人告诉他们需要注意什么。火灾发生，作为消防员，他们应召救火，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4点、5点、6点，按照原计划，我们本该在6点的时候出发，去他父母家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到他父母生活的斯佩利兹耶有40公里的路程。耕地、播种——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他的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希望他搬到城市里去生活，他们甚至还为他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的消防连队里服役，当他退役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消防员。除此以外，他别无他求！（沉默。）

有时候，我好像会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栩栩如生，听上去就像他在我的耳边轻声呼唤我。即便是照片也无法令我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他从来都不曾要求过我什么……即使是在梦中也一样。一直都是我在呼唤他，要求他。

7点，7点时，我被告知他在医院里。我闻讯立刻跑到医院，可是警察已经将医院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救护车。我听见那些警察冲着人群大叫道：救护车有辐射，大家离远一点！医院门口已经围了很多人，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赶往那里的伤者家属，那天晚上在核电站工作的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已经赶到了医院。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一位朋友，她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当她从一辆救护车上跳下来之后，我立刻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她的白大褂：“让我进去！”“不行，我办不到。他的情况不好，所有人都一样。”我死死地抓住她：“让我看看他就行！”“好吧，”她说，“跟我来。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最多20分钟。”

我看到他了。他全身水肿，皮肤胀得十分厉害。我几乎都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需要牛奶。大量的牛奶。”我的朋友说，“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喝下至少3升牛奶。”“可是，他不喜欢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那所医院的许多医生和护士最终都会生病，然后死去，尤其是在那儿工作的勤杂工。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早晨10点，摄影师希谢诺克死了。他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个死亡的伤者。我们得知，还有一个人被压在了爆炸的废墟下——瓦列里·霍捷姆楚科。他们根本无法到达他被掩埋的地点。于是，他们就在他埋在了混凝土下。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第一批走向死亡的人。

我说：“瓦斯亚，我该怎么做？”“离开这里！快走。你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可是，我怎么能够丢下他不管呢？他对我说：“快走！离开这儿！照顾好孩子。”“首先，我需要为你找一些牛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做。”这时，我的朋友坦尼娅·基贝诺克跑进了病房——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里。和她一同进来的还有她的父亲，他有一辆车。我们随即上了他的车，开到最近的村庄，弄到了一些牛奶。村庄距离市区大约3公里。我们买了许多3升装的牛奶，如此一来，所有人就都能喝到足够多的牛奶了。可是，他们刚一喝下牛奶就立刻呕吐不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时不时地陷入昏迷状态，医生给所有人都做了静脉注射。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燃烧的气体有毒，他们全都中毒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核辐射”。市区里到处都是军用汽车，军队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车和火车都停止了运行。士兵们用一种白色的粉末清洗街道。目睹此情此景，我开始为明天如何出城买新鲜的牛奶而担忧。直到这时，我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人谈论任何有关核辐射的话题。整个城市里，只有军队里的人带着防毒面具。人们继续像往常一样，从商店里买面包，然后把买来的面包包装在敞口的大袋子里。人们继续吃着装在盘子里的杯形蛋糕。

那天晚上，我没能进入医院。医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他病房的窗户下，他走到窗边，大声地对我说话。那情景简直令人悲恸欲绝！人群中有人听到了他的呼喊——当天晚上，他们就会被送到莫斯科去。



所有伤者的妻子立刻组成了一支队伍。我们决定要和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让我们和我们的丈夫在一起！你们没有权力分开我们！我们手握拳头大声呼喊，同时用力地敲医院的大门。士兵——当时医院里已经由士兵把守——他们将我们的队伍冲散。没过多久，一名医生从医院里走出来，对大家说：是的，他们将会被飞机送往莫斯科，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们带一些换洗衣物。他们之前在核电站工作时所穿着的衣服已经全都烧坏了。当时，城市里的巴士已经停运，于是，我们这群女人就在街道上飞奔，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收拾衣物。可是，当我们带着他们的行李包重新跑回医院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欺骗了我们，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一直围在医院四周喊叫和哭泣。

夜幕降临了。街道的一侧停着许多巴士，数百辆巴士——这些巴士都是准备用来疏散城中居民的，街道的另一侧则停满了消防车。他们都来了。所有街道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咒骂他们。城里的电台反复地播放他们的通知：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天里，城里的市民可能会被疏散到其他地方，在此期间，大家可能会暂时在树林的帐篷里生活几天，所以大家带上保暖的衣物。听到这一消息，人们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全城野营！届时，我们还将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五一劳动节。人们准备好了烧烤的用具和食物，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吉他、收音机。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只有那些当晚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的妻子们在哭泣。

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如何赶到了父母所在的村庄，那情景就像是我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妈妈：“妈妈，瓦斯雅现在在莫斯科。他们用一架特殊的飞机把他接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开始播种土豆。（一个星期后，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人们也被撤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会这样！天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开始呕吐。当时，我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我觉得很不舒服。那天晚上，我梦到他在睡梦中大声呼唤我：“柳西娅！柳西娅！”可是，

在他死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他呼唤我的名字。一次也不曾有。说到这儿，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早晨，我醒来后就一直在想：我必须去莫斯科。我一个人去。我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你要去哪里？你怎么去？”于是，我拉上父亲和我一同前往。临走前，爸爸去了一趟银行，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情景，就好像这段回忆从未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过一样。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拉住在路上见到的第一名警察，问他，他们把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立刻把地址告诉了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惊讶万分，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言之凿凿地威吓我们说，这属于最高机密。“第六医院，就在地铁站斯库金斯卡亚站。”

那是一所治疗特殊疾病的医院——专攻放射医学，必须凭通行证进入。我给了看门的那个女人一些钱，她这才说：“进去吧。”接着，我不得不挨个地哀求其他人。最后，我终于坐在了放射学科管理者——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像一名失忆症患者，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我必须要见到她。她一见到我立刻就问道：“你们有孩子吗？”

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隐藏我已经怀孕的事实。他们不会让我见他！幸好我很瘦，没想到瘦也是一件好事。从外形上，其他人几乎看不出我和普通人有何区别。

“有。”我说。

“有几个？”

我暗自思忖，我得告诉她我有两个孩子。如果我说只有一个孩子，她一定不会让我进去。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既然如此，你们也不再需要第三个孩子了。好吧，听着：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他的大脑也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好吧，我心想，那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烦躁不安。



“还有，你记住：如果你哭，我立刻就会把你赶出去。你不能抱他，也不能亲他，甚至不能距离他太近。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个时候，我早已打定主意，绝不离开这里。假如我离开，那也一定是和他一起离开。我发誓！我走了进去，他们正坐在床上打牌，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瓦斯亚！”见到他们，我立刻冲着他大叫起来。

他转过身：

“噢，好吧，我不玩了！没想到她竟然找到了这里！”

出现在我眼前的他看上去十分滑稽。他一向都穿52号的衣服，但是此刻他身上却穿着一件48号的睡衣。袖子和裤子都短了一大截。不过，他的脸已经不肿了。面部表情看起来也自然了很多。

我说：“你打得怎么样啊？”

他想冲上来拥抱我。

医生制止了他：“坐下，坐下，”她说道，“这里不准拥抱。”

我们听了，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就像听到了一个好笑的笑话。接着，所有人都从其他病房里赶了过来，所有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人都到齐了，总共28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城里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们，那些人已经开始疏散城里的居民，在三到五天的时间里，城市里所有的居民就都会被撤离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听了，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伤员——在转移到莫斯科的伤者中，有两名女性——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事故发生时，她正在核电站里值班。

“噢，天啊！我的孩子们还在那里。他们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其他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编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病房，去了隔壁的大厅。当他们离开后，我终于拥抱和亲吻了他，但是，他很快就闪到了一边。

“不要坐得离我太近。你拿把椅子。”

“这样做太愚蠢了。”我一边说，一边挡开了他递过来的椅子，“你看到爆炸了吗？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们是第一批赶到事故现场的人。”

“这次事故很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是人为蓄意破坏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当时，人们都这样说，他们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天，他们被限令只能待在各自的房间里，躺在床上，不准站在走廊上，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指关节敲打墙面，嗒、嗒嗒，嗒嗒、嗒。医生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的耐受性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在接受核辐射后的反应都不一样。医生们甚至还测量了他们病房墙壁的辐射强度。所有的墙壁都接受了测量，包括天花板和地板在内。原本住在他们楼上和楼下的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病房。他们成为了那栋大楼里唯一的病人。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朋友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水壶、盘子，尽管拿去。我为住在医院里的六个大男孩——他们都是消防员——做了六人份的火鸡汤。他们和他被排在了同一个小组，那天晚上正好轮到他们的小组值班。他们分别是：巴舒克、基贝诺克、提特诺克、普拉维科和提斯库拉。我给他们买了一些牙膏和牙刷，医院里根本就没有为他们准备这些洗漱用品。我还给他们买了些小毛巾。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为朋友当时的表现感到吃惊：他们都很害怕，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害怕呢？毕竟外面已经有一些风言风语了，可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尽管拿！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们那些人呢？他们能活下去吗？一定要活着！（说到这儿，她陷入了沉默。）那时候，我遇到了许多好人，现在，有很多人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她是一名看门人，她曾经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必须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

每天一大早，我都会赶往市场，然后再去我朋友家，在那里给他们



做汤。我必须把所有的食材都磨碎，碾碎，压成粉。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给我带点苹果汁来喝吧。”于是第二天，我就带着六个半升的装满苹果汁的瓶子赶到了医院。我准备的食物永远都是六份。早晨，我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然后在那儿一直待到晚上。太阳下山后，我再横穿整座城市，回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住处。我不知道如此下去自己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三天后，院方通知我，我晚上可以住在医生的宿舍里，而宿舍就在医院的大院里。上帝啊，这真是太好了！

“可是，宿舍里没有厨房。我怎么做饭呢？”

“你再也不需要做饭了。他们已经无法消化食物。”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之前的烧伤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伤口首先出现在他的嘴里，接着是他的舌头、脸颊——最开始，那些伤口还十分细小，但是很快就迅速扩大、蔓延。伤口处开始变得层层叠叠——看上去就像一层层白色的薄膜……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也……蓝色……红色……灰褐色。看着他，我的心都碎了！我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出当时的情景，也无法用文字把它们写下来！那情景只会令你感到生不如死！唯一能够将我从这一致命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快得让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哭泣。

我爱他！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他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才刚刚结婚。我们肩并肩走在街道上——他会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拥入怀中，然后亲我，不停地亲我。人们微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

那是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收治那些受到严重辐射感染的伤者。14天。14天后，一个人死了。

就在我住进医生宿舍的第一天，医生们用放射量测定器对我进行了严密的检测。我的衣服、手提包、钱包和鞋子——它们全都“烫”得厉害。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除了我的钱，就连我的内衣内裤都被收走了。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套病人服装——56号——和一双43码左右的拖

鞋。他们说，他们也许会把我的衣服还给我，也许不会，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洗衣房来“清洗”它们。当我穿着这一套衣服去见他的时候，他被我吓了一跳：“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给他做了一点汤。我先用一个玻璃罐把水烧开，然后再往里面加了一些鸡肉——切得很碎很细的鸡肉。后来，有个女人给了我一个水壶，我想她大概是这里的清洁工人或门卫。我又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了一块切菜板，用来切碎芹菜。因为身上穿着病人的服装，我无法去市场买菜，人们就给我带蔬菜。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液体也喝不去了，就连顺滑的生鸡蛋他都咽不下去。但是，我仍然想做一些可口的食物给他吃，就好像这样做能对他有所帮助一样。我跑到邮政局。“姑娘们，”我对她们说，“我需要马上给住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我的丈夫快不行了！”她们立刻就意识到我的丈夫是什么人，以及我来自哪儿，并且很快就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爸爸、妹妹和弟弟当天就坐飞机赶到了莫斯科。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行李，还有钱。当时已经是5月9号。他过去经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在胜利日，当他们燃放烟花的时候！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一看那美丽的景色。”

我坐在他身边，他睁开眼睛，问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现在是晚上9点。”

“打开窗户！他们马上就要点燃烟花了！”

我打开窗户，他的病房在八楼。从窗户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我们面前！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快看那儿！”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

我扭过头，看到他的枕头下放着一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她帮他买了这些花。



我转身跑到他的床边，亲吻着他。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他开始低声抱怨道：“你忘了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吗？不准抱我，也不准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好，然后给他铺好床，给他量体温。接着，我端起尿盆，出去洗干净，然后回到房间里。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开始感到有些眩晕，幸亏当时我正在走廊上，而不是在房间里。我死死地抓住窗沿，从而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一名医生从我身边经过。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立刻矢口否认：“不！我没有怀孕！”当时的我吓坏了，生怕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

“不要对我撒谎，”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负责人的办公室里。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她问道。

“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把我送回家。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

“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至少，我能在他身边陪着他……”

我十分感激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我这辈子都对她感激不尽！其他伤者的妻子也都赶来了，但是医院不准她们进来。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瓦洛佳·普拉维科的母亲不停地哀求上帝：“请带我走吧，不要带他走。”一位被大家称为盖尔医生的美国教授——他就是那位为他做骨髓手术的医生——尝试着安慰我。他说，虽然希望十分渺茫，但是毕竟还是有希望的。他的肌体是那么强壮，而他又是那么坚强！他们打电话叫来了他所有的亲人：住在白俄罗斯的两个妹妹以及住在列宁格勒的弟弟，他曾经在那里当过兵。娜塔莎是他们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

还只有14岁，她十分害怕，一直哭个不停。然而，她的骨髓却是最适合他的。（她再度陷入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够开口谈论这件事情了，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从没提起过这件事情。（又是一阵沉默。）

当他发现他们要从他最小的妹妹身上植取骨髓为他骨髓手术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拒绝了：“我宁愿死掉。她还那么小，不要碰她。”他的大妹妹柳达当时28岁，她自己就是一名护士，所以她十分清楚这一抉择意味着什么。“只要能让他活下去就行。”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他们俩躺在两张桌子上，彼此靠得很近。手术室上方有一扇大窗户。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柳达的情况甚至比他还糟糕。他们在她的胸部扎了18个小孔，她差一点就没能从麻醉药中苏醒过来。手术后的她十分虚弱，就像一个患重病的病人，而在此之前，她曾经是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柳达终生未婚。手术后，我穿梭于他们俩的病房之间。他已经从普通病房转移到了特殊的观察病房，病房里有一张透明的门帘，他的病床就在门帘后面。任何人都禁止入内。

他们在病房里安装了仪器，如此一来，医生们就能在不越过帘子的情况下为他注射药物和置换导尿管。帘子是用尼龙搭扣拴起来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不过，我一把拉开帘子，走进房间。我看到他的病床旁边有一把小椅子。他的情况糟透了，我一见到他就知道我再也不能离开他，哪怕一秒钟也不行。他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柳西娅，你在哪里？柳西娅！”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其他受伤的男孩们都被安置在隔壁的观察病房里，因为勤杂工拒绝照顾他们——他们要求医院配发防护性的服装——所以只能由士兵们负责照料他们的起居。那些士兵为病人清洗尿盆，擦地板，更换被褥。他们什么都做。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些士兵？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但是，他——他——每天，我都会听到死亡的信息：他死了。他也死了。提斯库拉死了。提特诺克也死了。死亡。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就觉得有一把大铁锤在狠狠地敲打我的头。